

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 第三冊

——國民革命與對外關係史

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 第二冊

——
國民革命與對外關係史

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 第三冊

——國民革命與對外關係史

定價：全四冊

精裝新臺幣一、一〇〇元 美金三六元
平裝新臺幣 九五〇元 美金三二元

編輯者：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
出版者：編輯委員會

總經銷：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〇六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〇〇二一八一—八號

承印者：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

臺北縣新店市寶強路六號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



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 第三冊

國民革命與對外關係史組 目錄

第一次討論會	一
--------	---

壹、論文	二
------	---

金德曼：孫逸仙與德國

一、提要	二
------	---

二、正文	五
------	---

貳、討論	二四
------	----

第二次討論會	三一
--------	----

壹、論文	三一
------	----

魯珍晞：西方對現代中國的歷史研究：以「五四」為例

一、提要	三一
------	----

二、正文	三四
------	----

白吉爾：五四運動後中國政治中的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一九一九——一九二三）

一、提要	五五
------	----

二、正文	五七
------	----

貳、討論·····	六七
-----------	----

第三次討論會·····	七五
-------------	----

壹、論文·····	七六
-----------	----

鄧勤臣：廣州時期英國人對孫中山先生的態度（一九二一——一九二五）

一、提要·····	七六
-----------	----

二、正文·····	七八
-----------	----

王聿均：加拉罕與廣州革命政府

一、提要·····	九〇
-----------	----

二、正文·····	九二
-----------	----

貳、討論·····	一一七
-----------	-----

第四次討論會·····	一二七
-------------	-----

壹、論文·····	一二八
-----------	-----

竹內實：黃埔軍官學校的歷史地位

一、提要·····	一二八
-----------	-----

二、正文·····	一三〇
-----------	-----

貳、討論·····	一四二
-----------	-----

第五次討論會·····	一五七
-------------	-----

壹、論文·····	一五八
-----------	-----

札奇斯欽：二十年代的內蒙古國民黨

一、提要·····	一五八
二、正文·····	一六一
劉家駒：從剛恆毅回憶錄看羅馬教廷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一九二二——一九三三）	
一、提要·····	一八〇
二、正文·····	一八一
貳、討論·····	一九九
第六次討論會·····	二〇九
壹、論文·····	二一〇
畢仰高：自發性農民騷動與農民對中共動員的回應（一九二〇年代初期至一九四〇年代末期）	
一、提要·····	二一〇
二、正文·····	二一一
貳、討論·····	二三一
第七次討論會·····	二三七
壹、論文·····	二三八
衛藤瀋吉：南京事變的一個分析——根據日美外交史料	
一、提要·····	二三八
二、正文·····	二四〇
貳、討論·····	二五一
第八次討論會·····	二五九

壹、論文·····	二六〇
-----------	-----

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與日本

一、提要·····	二六〇
-----------	-----

二、正文·····	二六一
-----------	-----

貳、討論·····	二七六
-----------	-----

第九次討論會·····	二八五
-------------	-----

壹、論文·····	二八六
-----------	-----

林微祁：華萊士訪華之行

一、提要·····	二八六
-----------	-----

二、正文·····	二八七
-----------	-----

貳、討論·····	三〇一
-----------	-----

第十次討論會·····	三〇九
-------------	-----

壹、論文·····	三一〇
-----------	-----

丁懋時：我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經過

一、提要·····	三一〇
-----------	-----

二、正文·····	三一三
-----------	-----

貳、討論·····	三二三
-----------	-----

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 第三冊

國民革命與對外關係史組

第一次討論會

時間：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三日（星期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九時四十分

地點：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理學院大樓一〇〇三教室

主席：黎東方先生

報告人及報告題目：

金德曼先生：孫逸仙與德國

評論人：李國祁先生

出席人：（略）

記錄人：江天健先生

壹、論 文

孫逸仙與德國

西德慕尼黑大學
國際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金德曼

一、提 要

在滿清覆亡後民國建立的七十五年里，只有孫逸仙思想和毛澤東思想是影響深遠而有作用、有系統之中國政治思想，這兩種思想廣泛的被中國人及其他世界人士所研讀。在國民黨有效統治中國大陸的二十多年裡，孫逸仙思想是中國重建、現代化及追求國際地位平等的準繩；在臺灣成功的建設努力中，孫逸仙思想持續不斷的被信奉並做為基本的指導原則。從數年前開始，雖然毛澤東思想逐漸的消退，孫逸仙在中國大陸上仍然受到尊敬，經過重新解釋後的孫逸仙著作，又開始再出版。從研究國外對他的印象中，例如德國，我們瞭解孫逸仙透過著作來喚醒廣大的同胞，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仍然有其存在的價值，對中國人而言，知道這世紀他們最重要的領袖在外國受到理解和評價，是件有興趣的事。

孫逸仙於一九〇五年訪問德國時，對德國，特別是柏林有了直接的印象，在近兩週的時間裡，他從柏林的中國留學生中，尋找革命運動的新伙伴。在一九一二年裡，孫先生花了三天的時間到膠州灣德國租界地做半官式的訪問，他視察了德國在那裡的制度和設施，並曾兩次提及青島是中國未來都市計畫的榜樣。他對德國在青島都市發展的努力所達到的多項成就印象深刻，並曾兩次提及青島是中國未來都市計畫的榜樣。他對德國在青島高度系統化的發展政策本質頗有好感，並體認到英國在香港和新加坡的都市發展政策，與德國比較是缺少整體性的。然而基於膠州灣租界是被德國經由不平等條約從中國所取得，他在訪問後接受德國知名作家兼記者 Erich von Salzmann 訪問時建議：德國政府應該考慮在未來的十年或二十年裡，經由協商而把膠州灣租界歸還給中國，孫先生答應中國不但會對德國在投資發展上的損失給與賠償，更賦與德國在中國市場上的特惠待遇。

孫逸仙與德國的第三次接觸，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中國國內正在熱烈爭辯是否應加入對德戰爭時，孫逸仙堅決的反對參戰。孫先生不否認德國對中國的政策也有帝國主義的性質，但與英國、特別是俄國比較，對中國的傷害就小多了。他很實際的認識到北京的軍閥政權，是想利用戰爭來加強其在國內的權力地位，並認為中國會從中得到利益，但戰後協約國列強並未讓中國得到應有的報償。德國自然希望支持中國國內反對參戰的個人和勢力，孫先生的立場，使德國認為與其有共同利益（有限的）。在這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德國在中國的代表與孫先生取得聯繫，並提供一百萬美金的財政支援。孫先生也許就運用了這筆經費，在南中國建立了在他歷史上有意義的國民黨地方性政權，由於他堅強的意願，在其去世前一年，國民黨在「北伐」的口號下開始了成功的統一運動。

正如孫先生所預期的，中國並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得到任何的利益。由於事前列強的秘密協定，凡爾賽和約嚴重的違反了民族自決的原則，是日本而不是中國，取得了德國戰前在中國山東省的權利，使中國拒絕在和約上簽字。這導致中國與德國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日又簽定了新約，使德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放棄在中國治外法權，並承認中國關稅自主的帝國主義工業化國家。孫逸仙瞭解威瑪共和的德國仍然保有受他欽慕的傳統美德，同時戰後的新德國更成為民主共和國，而失去在中國及其他第三世界地區追求殖民主義政策的能力與企圖。孫先生與列寧同樣認為凡爾賽和約是壓榨性的「不平等條約」，並削弱戰敗德國的國際地位，因此希望德國對他地方性的南方國民政府能給與外交承認，對他統一中國並予現代化的計畫給與經濟、軍事和技術上的支援，中國將以幫助德國從凡爾賽和約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做為回報。為了減少蘇俄政策在中國的衝突，孫先生把聯合中國、俄國與德國的同盟關係當成一種手段。

孫先生對德國觀念的形成，是受了對德國兩種社會改革措施特別有興趣的影響。孫逸仙受到亨利·喬治和約翰·米勒的理論發展之影響，而強烈的鼓吹土地改革之方法，與德國戰前在膠州灣租界所施行的土地法很接近，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將此一概念付諸實行。這方法的主要精神，在經由稅制而使土地國有化。由於一般社會發展或公共政策的結果，而導致地價增加，將歸國家所有，但地主個人的改良所得，將歸個人所有。德國在膠州灣租界土地法的起草人，前德國海軍法庭的法官 Wilhelm Ludwig Schrameier 受到孫逸仙的邀請，於一九二四年到廣東擔任其顧問，他死於一九二六

年。在此之前，在孫先生的支持下，並翻譯出版了 Schrameier 的有關膠州灣租界土地法原案的基本著作。孫先生另外對俾斯麥首相的社會改革政策更是着迷，雖然他曾明確的批評了俾斯麥的獨裁統治，但對俾斯麥能將四分五裂的德國各邦統一在強大的帝國之下，並從事社會改革政策感到無限的欽佩。照孫先生的看法，德國早期的社會改革政策，證明了下列二事：社會之進步有可能避免國內階級鬥爭的發生；馬克斯理論的預言，本質上是謬誤的。在孫先生的主要著作中提到俾斯麥的名字，要比包括威爾遜和列寧在內其他任何的外國政治家來的多。

在德國歷史和政治的作品及其他形式的出版物中，都可發現有關孫逸仙的人格和歷史的角色。最早德文有關孫逸仙的著作是在威瑪共和時期中，於一九二一年由 Karl August Wittfogel 所著，和一九二八年由孫先生短期的德國顧問 Gustav Amann 所著，這兩本書反應了國際上所共知的馬克斯鬥爭理論，並對孫先生之著作和活動做主觀的解釋。在這同一時期裏，德國出版了有關孫逸仙、戴季陶和 Manabendra Nath Roy 著作的德文譯本，由於孫先生鼓吹民主，在納粹獨裁統治下的十三年裏，沒有關於孫逸仙的德文書籍出版。自從一九四五年，在德國有許多有關孫逸仙的書出版，甚至東德也有幾本出版。美國是研究十九和二十世紀中國的領導國家，德國是除美國外出版有關孫先生著作最多的國家。第一屆歐洲孫逸仙研討會在奧國私人的基金會贊助下，慕尼黑大學和奧國 Salzburg 大學的研究機構聯合發起下，於一九七九年在 Salzburg 大學召開。第一次有關孫逸仙及同一時代中國歷史照片和書籍的展覽，在巴伐利亞邦圖書館的協助下，於一九八二年在慕尼黑揭幕，巴伐利亞文化部長、也是知名政治思想史家 Hans Mayer 教授並發表演講。在展出的同時，第一部外國製作有關孫逸仙生活和影響的歷史紀錄片，在巴伐利亞電視臺播出。這展覽於一九八五年夏天又在波昂展出。

經由德國人努力研究和強調孫逸仙複雜決定因素的戲劇性生活，和在理論上、心理上及實踐上對中國命運持續性的影響，孫逸仙在德國引起了注意和研究的興趣。

二、正文

(一) 孫逸仙與對德和戰問題 (一九一七年)

在十九世紀中葉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間，工業化列強國家之外交政策的特性，是競爭性的殖民帝國擴張主義。德意志帝國利用屬於受其保護教會的兩名傳教士被殺事件，強迫中國將山東半島包括青島的膠州灣地區租給德國，爲期九十九年。(註一)那時的德國已成爲對中國貿易的第二大西方國家。與英國、俄國、日本、法國等國家相比，直到那時德國從未奪取任何中國的領土或保護地，德意志帝國政府有心以膠州灣小小區域發展成「殖民地的典型」及「德國之香港」。(註二)

然而自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首相大隈重信 (Okuma Shigenobu) 及其外相加藤高明 (Kato Takaaki) 企望將日本的勢力伸入遠東、太平洋地區，而取代德國在此區域內的影響力。(註三)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德國把膠州灣地區讓給日本，將來再由日本歸還給中國。德國拒絕了東京的要求，並答應把膠州灣直接歸還給中國，但要求在戰後再收回或優先承租此一區域。日本聯合英國強迫中國拒絕此一要求。(註四)雖然中國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六日宣佈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立，但日本仍然出兵登陸山東半島，包圍青島，並於十月一日佔領青島。日本同時奪取德國在南太平洋的兩島嶼——馬里亞納 (Marianen) 和卡洛林納 (Karolinen)。中國由於受到協約國的壓力和德國宣布「無限制潛艇戰爭」影響，而於一九一七年五月十四日與德國斷交。(註五)這一發展引起了國內外對中國是否應該對德宣戰或保持中立的激烈爭辯。

以國務總理段祺瑞和督軍團爲首的中國軍事執政團，以各種理由鼓吹中國應該對德國宣戰。(註六)他們認爲如果中國成爲協約國的盟友，則將來在戰後的和平會議上將能取得談判的地位，以維護中國的權益，特別是在有關膠州灣的主權問題上。另外他們認爲加入戰爭後，將會使列強對中國做暫時的或永久的讓步。而他們最主要的動機是想從日本得到

貸款和軍火的供應，以便加強他們在中國政治場上的權力和地位。其他一些中國知識份子領袖也贊成對德宣戰，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宣稱：這是一場正義（以協約國爲代表）與強權（代表軸心國）的戰爭，中國有道德責任要加入正義的一邊。梁啟超認爲如果次殖民地的中國能加入協約國對德宣戰，將能獲得利益並能增進國際地位。（註七）但其他有些團體反對中國向軸心國宣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華民國的創建者和第一任總統孫逸仙，（註八）他是當時最重要的革命領袖。在國民黨內出色的知識份子朱執信（一八八五——一九二〇）協助下，孫逸仙利用對中國是否要加入戰爭的爭論中，寫了許多有關國際政治和中國國際地位的重要文章。這些文章表面上的目的是要進一步指出中國不應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在「中國存亡問題」（註九）這篇文章背後更重要的動機，是要利用戰、和問題來激發中國人對中國實際國際地位不平等，以及潛在的危險產生認知。

孫先生強烈的呼籲中國應該保持中立。他說戰爭的本質是罪惡的，人們應該以外交方法去解決爭端問題。德國既表示願意與中國談判，爲什麼中國不能先和德國以外交談判的方式來增進其國際地位？（註一〇）對協約國代表正義、軸心國代表邪惡的簡單二分法，孫逸仙提出質疑：「謂德國代表有強權無公理之勢力，德國一勝，公理將淪；則試問英國所以併蘭斯哇，併印度，併馬拉者，據何公理？所以奪我香港，奪我緬甸者，據何公理？逼我吸銷鴉片，割我國土地爲彼勢力範圍，據何公理？法之吞我安南，俄之吞我滿洲，問我外蒙，又據何公理？就此數十年來之歷史，無甚高論，協商國亦豈非有強權無公理者乎？數十年前，英國能用其強權以行無公理之事，則不顧公理，今日英之強權遜德，則目德爲無公理，而自諱其從前之曾用強權，此種議論奈何可輕信之？如使今日有人果爲護持公理而戰者，必先與英、法、俄戰，不先與德、奧戰也。然而吾人對於英、法、俄尚不主張宣戰，自無對德、奧宣戰之理由。」（註一一）

孫先生建議中國人應先問自己，德國是否較其他列強對中國造成更大傷害？他寫到：「以土地論，德國將來之野心，誠不可知。論其過去與現在，實可謂之侵犯中國最淺，野心最小者。以割地言，則中國已割黑龍江沿岸最豐饒之地於俄，割緬甸、香港於英，割安南於法，割臺灣於日，而德無有也。以租借言，則英佔九龍、威海衛，法佔廣州灣，俄佔旅順、大連，又轉讓之於日。論其前事，德占膠州，罪無以加於他國。而今者膠州已歸日占，更無德人危我領土之虞。」

以勢力範圍言之，英國占西藏、四川及揚子江流域，約占中國全國幅員百分之二十八。俄國括外蒙、新疆、北滿，約占百分之四十二。法國占雲南、廣西，日本占南滿、東內蒙、山東、福建，均在中國全國幅員百分之五以上。至於德國，前雖樹勢力於山東，不過中國全國幅員百分之一。以視英、俄曾不及其二、三十分之一，即法與日亦數倍之。」（註二）

孫先生問到：對一個侵略中國最少的國家宣戰是否合理？協約國從未尊重中國的主權。列強希望中國參戰，除了其他的利益外，還希望驅逐德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和市場。孫逸仙統計出一九一一年青島對外的輸入和輸出，顯示德國在中國市場的佔有率與佔領青島港無關。他將德國在中國經濟上令人眼紅的角色，歸因於下列三個因素：

1. 商品之信用。

2. 營業之精神。

3. 對於中國人之精密研究。

他認為雖然德國人進入中國市場較遲於其他的競爭者，但因為德國的商人優於他國的商人，所以能很快的取得重要的地位。（註三）

德國儘可能的希望中國不要對其宣戰，所以注意到孫逸仙的有力反戰活動，包括他致英國首相勞合喬治（Lloyd George）的一封信電報。（註四）然而由於中國外交上抗議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戰政策」，以及一艘載有支援歐戰的五百名華工的法國船在航行歐洲途中，被德國潛艇擊沈後，中國政府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十日遞交一封信意欲斷交的備忘錄給德國駐北京代表。（註五）當時德國駐上海總領事肯尼賓（Knipping），保有一份有關德國支持孫逸仙反對參戰努力的外交備忘錄。（註六）這一份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報告包括下列有關事情：

德國大使波文辛基（Paul von Hintze）海軍元帥，指示德國駐上海總領事肯尼賓與孫逸仙取得聯絡，商討有關推翻段祺瑞總理及其內閣的事，並支援二百萬元（約等於一百萬美元）經費。一位孫逸仙的信徒 Abel Ts'ao（可能是曹亞伯）做為中間的聯絡人，Abel Ts'ao 擔任孫逸仙與德國外交官員 Mr. Schirmer 間秘密談話的協助者。會談達致了一個協議，那就是共同防止中國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並期望推翻段祺瑞內閣。孫逸仙重申他推翻段祺瑞的意願，並要

求支援上述二百萬元經費，以影響中國的陸軍和海軍。孫先生努力的結果，使中國在上海的艦隊於重申効忠北京政府後，開往廣州以支持孫逸仙。由海軍、廣東省軍人和前北京國會議員在南方成立非常國會的支持下，孫先生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成立了中華民國軍政府，以支持他的護法運動。（註一七）德國的報告中也提到孫逸仙請求美國總統威爾遜（Wilson）協助中國避免介入戰爭，是基於孫先生與德國先前的協定。（註一八）肯尼賓認為，直到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三日孫先生的南方政府沒有對德國宣戰，是一種純策略上的運用。（註一九）實際上孫先生於一九一八年派遣 Abel Ts'ao 帶草約去德國，希望德國（可能在俄國的合作下）支援他的政府，以換取中國原料的供應。然而，在採取任何行動之前，戰爭已因德國的失敗而結束。（註二〇）

孫逸仙於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七日演講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四講時，以優雅地舉證的態度，說明一九一七年中國是否應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爭辯中自己的親身經驗。下列這一段話十分傳神的描繪出孫先生辯論的類型：

「再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可以和諸君談談。當歐戰最劇烈的時候，我在廣東設立護法政府，一天有一位英國領事到大元帥府來見我，和我商量南方政府加入協商國，出兵到歐洲。我就向那位英國領事說：『爲甚麼要出兵呢？』他說：『請你們去打德國，因爲德國侵略了中國土地，佔了青島，中國應該去打他，把領土收回來。』我說：『青島離廣州還很遠，至於離廣州最近的有香港，稍遠一點的有緬甸、布丹、尼泊爾。像那些地方，從前是那一個的領土呢？現在你們還要來取西藏；我們中國此刻沒有收回領土的力量，如果有了力量，恐怕要先收回英國佔去了的領土罷。德國所佔去的青島地方，還是很小，至於緬甸便比青島大，西藏比青島更要大。我們如果要收回領土當先從大的地方起。』他受了我這一番反駁，就怒不可遏，便說：『我來此地是講公事的呀。』我立刻回他說：『我也是講公事呀。』兩人面面相對，許久不能下臺。後來我再對他說：『我們的文明已經比你們進步了二千餘年，我們現在是想你們上前，等你們跟上來；我們不可退後，讓你們拖下去。因爲我們二千多年以前，便丟去了帝國主義，主張和平，至今中國人思想已完全達到這種目的。你們現在戰爭所堅的目標，也是主張和平，我們本來很歡迎的；但是實際上，你們還是講打不講和，專講強權不講公理。我以爲你們專講強權的行爲是很野蠻的，所以讓你們

去打，我們不必參加。等到你們打厭了，將來或者有一日是真講和平，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參加到你們的一方面，共求世界的和平。而且我反對中國參加出兵，還有一層最大的理由，是我很不願意中國也變成你們一樣不講公理的強國。如果依你的主張，中國加入協商國，你們便可以派軍官到中國來練兵；用你們有經驗的軍官，又補充極精良的武器，在六個月之內，一定可以練成三五十萬精兵，運到歐洲去作戰，打敗德國。到了那個時候，便不好了。『英國領事說：『爲甚麼不好呢？』我說：『你們從前用幾千萬兵和幾年的時候都打不敗德國，只要加入幾十萬中國兵，便可以打敗德國，由此便可以提起中國的尚武精神。用這幾十萬兵做根本，可以擴充到幾百萬精兵，於你們就大大的不利了。現在日本加入你們方面，已經成了世界上列強之一，他們的武力雄霸亞洲，他們的帝國主義和列強一樣，你們是很怕他的。說到日本的人口和富源，不及中國遠甚。如果依你今天所說的辦法，我們中國參加你們一方面，中國不到十年，便可以變成日本。照中國的人口多與領土大，中國至少可以變成十個日本。到了那個時候，以你們全世界的強盛，恐怕都不夠中國人一打了。我們因爲已經多進步了二千多年，脫離了講打的野蠻習氣，到了現在才是真和平。我希望中國永遠保守和平的道德，所以不願意加入這次大戰。』那位英國領事，半點鐘前幾乎要和我用武，聽了這番話之後，才特別佩服，並且說：『如果我也是中國人，一定也是和你的思想相同。』』

（註二）

德國和孫逸仙之間短暫而有限的共同利益，雖未達到阻止中國參戰的目標，但顯然導致德國對孫先生的財政支援，使孫先生能够在中國的土地上建立地域性的權力基礎，爲挽救中國瀕於危險的民主制度和全國統一而奮鬥。

（二） 孫逸仙與威瑪共和 (The Weimar Republic) 時代的德國

如同孫逸仙實際地預測，當與德國進行和平談判並及膠州灣問題時，中國經歷了極大的失望。雖然開始時遭到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反對，在凡爾賽和約第一五六到一五八條中明定德國必須放棄所有的權力和特權，並承認膠州灣之權益讓給日本，而不是還給與協約國共同作戰的中國，縱然她是這塊受爭議地區的原來所有國。結果中國採取了不尋常的步

驟，拒絕簽署這一有問題的和約。（註三）孫逸仙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七日演講三民主義時，提及威爾遜主張的民族自決原則，曾激起興奮的回響，特別是亞洲的殖民地及次殖民地國家，相信這普遍的正當性和即將適用的和平、正義原則；許多大英帝國或法國的殖民地屬民，甚至熱情的幫助他們自己的敵人來贏得戰爭。

中國之參戰也同樣受到民族自決原則的刺激，認為採行此一原則後將會得到利益。在戰爭最危急的時刻，英國和法國都會在口頭上支持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計劃，然而戰爭一勝利，他們儘可能的阻擾威爾遜想法的實現，而遂行其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

孫先生繼續認為，和平條約的結果，是歷史上最不平等的條約之一。弱小國家不僅被拒絕自決，而且處於更大的壓迫下。但從心理層面而言，威爾遜被藐視的自決原則已產生了建設性的結果。意識到被勝利的帝國主義列強所欺騙，受到壓迫的國家得到新的鼓勵，為國家的自我解放而努力。（註三）

因為中國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所以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日在北京簽定了雙邊協定，以使戰後中、德關係正常化。由於德意志帝國的崩潰，而產生了威瑪憲法時代的德意志共和國，德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以完全平等的基礎上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註四）

孫逸仙在五月五日就任中華民國政府非常大總統之職，這個政府由在廣東的非常國會於一九二一年四月所成立。雖然在實際上這個政府所能控制的範圍有限，但她却自認為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並負有推翻北京非法軍閥獨裁統治的使命。北京政權是得到外國列強所承認的法律上政府。（註五）不論孫逸仙如何努力，沒有一個國家對其小而而不穩定的權力基礎之政府予以外交承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結束後，孫逸仙強烈批評協約國的帝國主義和道德偽善，使列強對其國民政府持否定的態度。於是孫先生把他的眼光放在另外兩個工業化大國——威瑪共和的德國和蘇聯，這兩個國家在戰後被逐出世界的政治舞臺，不屬於國際聯盟的成員。德國戰後的主權受到多重限制，並負擔巨額的賠償。屈辱和感覺受到西邊的法國、東邊的波蘭、東南邊受法國影響的小協約國所包圍，戰後的德國遂發展出雙面的外交政策之觀念；一方面與受限制但肯定能合作的蘇聯打交道，另一方面逐漸與西方列強關係正常化而和解。（註六）